

眾所周知，漢語神學運動能激起第一波重要回響，主要是因兩位漢語神學的早期「教父」（劉小楓與何光滬）在九〇年代初發表他們的漢語神學提綱，進而在各地華人學者中激發出回應。³由於在過往的華人社會中，神學院與大學的關係比較疏離，在中國大陸就更是相對隔離而互不相干的不同教育體系，因此才傾向以為彼此沒有共通語言，甚至是不可共量的學術。⁴不過，悖論的是漢語神學倡導者是來中國大陸大學的建制語境，從一開始他們自然和必須強調其論述的人性和學術性，因此漢語神學和基督教研究便在研究進路和內容上產生極大的重疊，致使非認信的學者很大程度上能認同這個學術運動中應包括神學研究的內容，這便產生出一個互相和應及影響的微妙作用，也使在概念上本有分別的二者在實踐上一再重疊。就目前的情況，我們只可以籠統地說，漢語神學是基督教研究的內核，兩者關係密切，叫評論者難以把它們清楚劃分。⁵

過往的種種爭議在二十多年來帶來的另一個悖論效果，是讓兩岸四地及其他華人地區研究基督宗教的學者和機構，在誤會過後產生出形形色色的對話與合作，至今仍然蓬勃發展，令長期以來在兩岸四地的漢語學界本來被受冷落的基督教研究突然變得繁盛起來，使參與者愈來愈眾，討論也愈見深化和成熟，並造就了一些備受中國人文學界所接受和吸收的神學成果。而「漢語神學

3. 這方面的一個綜覽可參李秋零，〈「漢語神學」的歷史反思〉，載李秋零、楊熙楠編，《現代性、傳統變遷與漢語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643-649；兩位「教父」思想的特徵也可參 Lai & Lam，〈漢語神學的回顧與展望〉，頁 7-8。

4. 相關討論可參曾慶豹，〈華人神學的語言轉向及其詮釋的衝突〉，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頁 195。

5. 參李秋零，〈「漢語神學」的歷史反思〉，頁 647-648；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頁 viii。

圓桌會議」正是在漢語神學運動發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公共學術平台，從第一屆於一九九六年在馬來西亞舉辦至今，已經進行了四次，並帶來了重要的豐碩成果。⁶

第四屆的「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議」於二〇一〇年三月底在上海同濟大學和蘇州舉行，這也是圓桌會議首次在中國大陸高校舉行。這次會議歷時七天，共舉行了十二場討論。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共三十餘位學者共聚一堂，共謀漢語神學之發展。擺在讀者面前的這份論文集，便收編了是次會議的大部分文章。

今天的中國，在大國崛起意識下，國學和儒學盛行、民族主義興起，中國學界正逐步從過往注重吸收西學到今天重視建構具自主意識的當代學術，這個嶄新的大變局對漢語神學的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正是本次大會的核心討論，大會以「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傳承與發展」為主題，下設三個分題：「漢語神學：傳承與發展」、「漢語神學與中國當代學術」、「漢語神學與當代中國及其未來」。出席第四屆圓桌會議的學者及發表的論文詳列如下：

第一部分：漢語神學：傳承與發展

在第一部分，不少學者就着漢語神學運動過往十多年來的方方面面作出評論。新加坡學者鍾志邦教授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宗旨與方向作出了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張旭教授重閱十年前劉小楓所撰的〈漢語神學與

6. 首兩屆會議的成果可見於劉小楓、謝品然、曾慶豹編，《現代性、傳統變遷與神學反思：第一、二屆漢語神學圓桌會議論文集》（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9），及第三屆會議的成果收入李秋零、楊熙楠編，《現代性、傳統變遷與漢語神學》。

歷史哲學》，⁷探求漢語神學的自我定位與發展方向，而清華大學王曉朝教授則廣泛地梳理了何光滬、劉小楓、李秋零等人對「基督事件」的不同理解，強調基督事件作為信仰來源的公共性。順此，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倡導把漢語神學看為一種既文化又神學的運動，由於參與者的背景、興趣等不同，加上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影響，令這運動在發展上更為健康。

除了回顧以外，漢語神學的參與者也是首節的焦點。北京大學吳飛教授指出漢語神學主要是對文明而不是對教會負責，為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的合法性創造空間。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子淳博士則以社群性為視角，追問漢語神學人的特殊社群性身份。華東師範大學李向平教授進一步指出漢語神學形成了「無形的教會」與「公共的信仰」，其「去教會性」恰好是其公共性得以建構的基本要素，更從這公共關懷討論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公共理性應如何實踐的問題。上海師範大學謝志斌教授探究漢語神學中基督教倫理研究的基本思路問題，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黃保羅博士則從多角度梳理「漢語學術神學」這個概念，並其發展所具有的活力。而香港中文大學溫偉耀教授則通過比對西方神學歷史的發展來討論中國有沒有神學、怎樣做漢語神學及漢語神學的公共性等問題。

第二部分：漢語神學與當代中國學術

在會議的第二部分中，學者以歷史、經典和思想家為題反思漢語神學與中國當代學術的關係。復旦大學李天綱教授深入討論了外來宗教與本土宗教之間的關係問

7. 載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3-96。

題。同濟大學何小蓮教授則採用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文化調試理論，思考傳教士自身的文化背景對於當時中國的精神歷程的意義。同校的周萍萍博士以兩個半世紀前的耶穌會士劉松齡 (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 為例，探討傳教士在華以科技傳教方式的意義與影響。北京大學孫尚揚教授以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實業家聶雲台的信仰歷程變化為例，理解其信仰變化過程中所體現當時社會中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並探析對漢語神學的啓示。

在處理經典方面，針對漢語學界開展《聖經》研究必須面對「多元經典」處境，中央民族大學游斌教授提出以「比較經學」作為漢語基督教經學的可能途徑。南京大學成祖明博士則介紹「正典進路」並其對現代儒學重建的意義。浙江大學梁慧教授探討吳雷川如何運用孟子的歷史解釋方法解讀福音書中耶穌的生平和言行。馬來西亞學者余德林教授力圖透過兩個漢譯《聖經》版本，思考漢語神學和語言作為思想載體之間的關係。台灣中原大學曾慶豹教授認為目前華人教會多以「道德技術理性」為主的「致用」 (pragmatic) 而非「經世」 (public) 為旨，所以神學生產多在「知識經濟」的前提下強調神學或釋經的實用主義傾向。

論到個別思想家方面，同濟大學冷欣博士和建道神學院郭鴻標教授皆探究了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的思想。前者對其關於啓示與歷史的關係以及作為間接啓示的歷史之結構予以剖析和評價，而後者則將潘能伯格與雲格爾 (Eberhard Jüngel) 作比較，指出兩者都是首先設定信仰，然後用理性解說信仰的合理性。同濟大學孫周興教授討論《哲學論稿》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中的上帝問題及關於神學的沉思，同校的徐衛翔教授介紹了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思想

的核心——一種以基督為宇宙核心的進化論，而浙江大學張新樟教授以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意識學說，闡明真理體驗與教條之間的關係，及其對漢語神學建設的啓發。

第三部分：漢語神學與中國社會之變革

到了會議的第三部分，論文主要聚焦中國社會變革的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偉馳研究員討論中國現代歷史上，中國佛教和西方基督教、人文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之間的「教爭」及其變化。武漢大學趙林教授探析了漢語神學面臨的時代課題。四川大學蘇州研究院沈陽博士回顧中國人族群觀念的變化，對各種民族主義情緒進行了分析，提出基於基督教－法政系的若干文化與制度的建構及意義。

另外兩篇文章則對當前基督教參與者或研究人員作了實證研究。南華工商學院易江教授對廣東農民工的生存及基督教信仰狀態進行了調查，以此來解讀信仰對人的意義。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高莘博士則調查了中國大陸高校基督教研究領域的年青學者們，從其學術傾向、研究旨趣、信仰委身、教會隸屬、專業訓練等做了較為客觀的概括性總結。

經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篩選，這份論文集收錄了會議中的二十二篇論文，其中包括數篇已向會議提交但未能在會上宣讀的文章，並以四個部分排列，分別為「漢語神學現狀研究」，「漢語神學的研究主體」，「處境下的釋經與神思」和「回顧與展望」。

第四屆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議除了首次在大陸高校舉行，顯示出大陸學界對基督教研究已從猶豫觀望進到積極參與的階段外，今屆圓桌會議還展示了若干新的

突破。首先，第一屆「漢語神學圓桌會議」舉行時，在中國大陸學界以「神學」冠名的會議極為少見，而發展至第四屆圓桌會議時，名字已易為「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會議」。如賴品超教授在其文章所指出的，這表明了漢語神學作為一種既文化亦神學的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全方位式的基督宗教研究，由最初的以文、史、哲為核心的論述，拓展至包括《聖經》研究、宗教社會學、公共神學等進路的全面綜合性的基督宗教研究。

第二，漢語神學運動由開始至今，單單大陸學界參與「神學研究」的學者已經翻了幾代，⁸因此如上所述，從開始時靠賴以文、史、哲訓練為主的學者的時期，已發展至在各重點大學中有宗教學系的設立，更有不少在海內外宗教學系和神學系／院畢業回國的「海歸派」學者參與。在本次會議上我們喜見老、中、青三代漢語神學的研究者共聚一堂，進行坦誠、平等而友善的交流。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學者，他們展示了相當精專和多元的研究路向，豐富了漢語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建構，並展示出新一代學人對神學的理念和研究已漸趨專業。

第三，由於大陸教會在過去二十年在學術上也有長足發展，因此本屆圓桌會議與會學者不但來自大學和研究院，更有來自教會和神學院的學者參加是次會議，使漢語神學的討論切實成為溝通學界與教會界的橋樑，促進了不同範式之漢語神學的溝通。這也是狹義的漢語神學和大公教會神學傳統具體交流的重要一步，相信未來廣狹義的漢語神學將出現更多的互動關係，人文學界的神學研究也可對普世神學作出更多貢獻。

8. 參何光灝，〈江山代有才人出——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素描〉，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9（2008），頁 53-75；此文曾作出扼要的分代論述，但其分代法和立論也頗具爭議。